九连锅不熄

◆笔走万象 ⊕陈公炎

立冬刚过,义乌乡村便悄然漫开清甜的蔗香。

天光未亮,晨雾轻笼乡野,上溪镇王村的红糖共富工坊已经率先亮起灯光。亮灯的人是王文斌。每日开工前,他总会先来工坊,从蔗汁管道到电路,再到角落里的灭火器,逐一查看。车间里布三条生产线,三排铁锅由大至小整齐排列,每排九口静卧于灶台,静待烟火升腾。

每年榨糖季,工坊的第一缕灶火,都由他点燃。引火、起炉,动作干脆利落、沉稳审慎,这是二十九年军旅生涯刻进他骨子里的严谨细致。火苗蹿起来,他蹲在灶前盯了好一会儿,确认没有隐患,才拍拍手上的灰站起身。

蔗汁入第一口锅,白汽升腾起来,整座工坊仿佛一下子活了。

“有糖无糖,立冬绞糖。”老辈人传下来的话,藏着节气的讲究。立冬前后,甘蔗攒足了一年的糖分和水分。蔗农们天不亮就下地,砍蔗、捆扎、装车,一车车送往工坊。榨出来的甘蔗汁,去掉杂质后被倒入一个大铁锅中烧煮。随着柴火噼啪作响,混着草木清香的热气从工坊里飘散出来,在村庄的小路上弥漫开来。村里人说,一到这个季节,连巷子里的风都是甜的。

第一口锅最大,大火煮沸,蔗汁表面浮起细密的沫子。老师傅俯下身,拿根长柄勺一勺一勺撇净。“头道沫子不去净,这锅糖就不纯。”他头也不抬地说。来研学的孩子踮着脚问:“爷爷,还要多久呀?”老师傅直起腰,嘿嘿一笑:“熬糖跟过日子是一样的,猛火烧不出甜味,得慢慢脱水、慢慢沉淀,急不得,也快不得。”孩子们似懂非懂,一旁的家长们却都笑了。

蔗汁从大锅转入小锅的时候,颜色由青转黄,一缕缕热气往上冒,锅里面的糖水也越来越浓稠了。熬至第七、八口锅时,就到了最要紧的关口。此时,糖浆已经非常细腻透亮,润成暖金色,需转成文火慢熬。最后一锅熬定,即刻倒入松木糖槽,师傅们持勺不停翻拌,以防煳底发苦。随着灶间烟气慢慢淡下去,糖丝被一点点牵出来,细如发丝,晶莹透亮——这一手功夫,没有一二十年工夫,是练不出来的。

正宗的义乌青红糖没有鲜艳的色泽,在浅黄色之中透着一丝淡淡的青色,抓一把能捏成团,稍碰一下就会簌簌散开。入口清新甜美、淡雅不腻,回味无穷,是时光与火候养出来的本味。

七年前,在部队当了六年团长的王文斌,自主择业回到家乡,当了村党支部书记。当时的王村虽被称为“上溪红糖第一村”,但仅有一些小型作坊零星生产,产品质量良莠不齐、市场价格难以提升、销售渠道不稳定,村里的年轻人也大多外出务工,传承手艺的人越来越少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,他走访各地的糖店,查阅大量的顾客评价,心里有了答案:王村不缺熬糖的本事,缺的是统一的标准、叫得响的名号,还有把零散农户拢在一起的力量。于是,村里成立了以集体控股形式运行的红糖公司,将老作坊聚集在一起进行改造升级,坚守“九连锅”古法制糖技艺,建立标准化生产线,设立食品共享检测中心——甘蔗进厂前要进行检查验收,熬糖的每个环节被严格监控,产品必须经过理化检验后才能打上“上品红糖”的标签。每罐成品都配有溯源码,消费者扫码可以查询到产品来自何地、何时收割以及由谁制成。一开始有些老工匠觉得麻烦,不想参与,但王文斌没有让步:“我们卖的不是土特产,是‘上品’。‘上品’就得有‘上品’的规矩。”这规矩,是给消费者的定心丸,也是王村“上品红糖”安身立命的底气。

规矩立住了,一根甘蔗也开始生出更多滋味。糖罐、糖坊、糖铺、糖咖连成一片,糖铺上摆着五十多款衍生产品,斜对面的“蔗家咖舍”里,红糖拿铁、姜汤拿铁飘着香气;三百六十平方米的地下冷库锁住蔗汁鲜度,熬糖研学随时能接待来客。孩子们来到这里参加研学活动,可以亲手砍一根甘蔗,当一回“小小糖工”,离开时带一罐自己亲手制作的红糖。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绘本《红糖甜甜》,那“一根甘蔗的奇妙旅程”素材便取自王村。村里还对接了恒风集团,把王村“上品红糖”的广告铺到高铁站、轻轨站和公交站台,订单随之而来,电商销售额一个月提升了四成。

而这锅红糖的甜,早就飘出了王村的院墙。王村被纳入上溪镇“金萧共富带”,共同传承好义乌传统制糖技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去年,村里又争取到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,红糖产业共富中心落了地,检测、直播展销、冷链、研学一条龙配套,村里和周边数百户蔗农都跟着这条链走,正走向规模化种植生产。

夜色渐深,乡村安静了下来,工坊里灯光柔和,九口锅的余温还在。这熬糖的火,王文斌一守就是好几年,往后也不会灭——他心里清楚,自己守的不只是九口锅,更是全村人日子里实打实的甜。

父亲的佛堂缘

◆岁月留痕 ⊕吴潮海

每逢时令交替,心底总有微澜泛起,去走走父亲情有独钟的第二故乡——佛堂。尽管这里不是他的桑梓地,但毕竟他曾居于斯、长于斯,并且对这里富有特殊的情感。

我们的祖籍是东阳,爷爷做木匠辗转来到义乌,就在这里定居下来。最初的生活非常艰辛,真是“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寸地”,爷爷只能住在佛堂镇上叶村附近的庙宇、祠堂里。

父亲出生于1914年,时逢民生凋敝。我家处于底层,更是苦不堪言。七八岁时,父亲靠扶盲人走村串巷算命、乞讨聊以度日。稍长,经介绍,父亲到饮食店当学徒,一当就是近二十年。当学徒这么久,不是他榆木脑袋不开窍,而是实在没地方去,再加之他老实勤快,东家不愿放。一位朋友(人们称她为“红曼姐”)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
“我来帮你!”红曼姐快人快语,为人诚恳热情,通过二十几家东挪西借,有的借碗,有的借麦子,有的借面板……就这样,她为父亲基本凑齐了摆摊的基本条件。

父亲没有文凭,家庭困境使他失去了学习的机会;但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,对于红曼姐的帮忙,他终生铭记,逢年过节都要带着礼品去拜访。

1941年,由于多种原因,我们离开了佛堂,落户义亭。但父亲对佛堂还是情有独钟,时不时要到佛堂东家走走。每遇节假日,尤其农历十月十民俗活动(物资交流),东家必邀请父亲过去帮凑。父亲则有求必应,有时也带我去。佛堂地处码头,时不时能看到一些新鲜事物。

有一年,我们在佛堂,正巧雷雨交加,义乌江发大水,失去了往日的温顺,如同一头咆哮的巨兽。佛堂浮桥在滔天浊浪中显得渺小而脆弱。那些钢铁链条,此刻在自然伟力面前显露出疲态。它们在水下若隐若现,如同巨兽的筋骨,在暗流的冲刷下发生着肉眼难辨却致命的偏移。桥身随之起伏,发出低沉的轰鸣,与雷声交织在一起。此时,管理人员不得不撤掉铁链,把浮桥漂至岸边。我们过不了江,回不了家,真是应了旧谚:“天留客,天留我不留”。

父亲在佛堂当学徒近二十年,习得一身好手艺,尤其是拉面,闻名遐迩,号称“牵面小弟”。他先是在义亭老火车站摆流动小吃摊,后来在义亭老街上开了饮食店,支撑全家生活。公私合营后,他担任义亭饭店副经理,后又被委任义亭车站饭店经理。父亲非常有责任心,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,起得比谁都早,天不亮就先给当班的同事捞好面,到了上午九点左右,又为同事蒸好饭。就凭着这股事事抢在前头的实诚劲,他时不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、劳动模范。

不仅如此,他还为人清正。他担任饭店经理时,我和妹妹正值猛长身体的年龄,没到放学时间,肚子就唱起了空城计。好不容易挨到放学铃响,我们便急匆匆地往家里赶,来不及放下书包,就径直奔向灶台,寻找可填肚充饥之物。待晚上八九点父亲回家,我就恳求着说:“爸爸,您让我吃顿饱饭吧!”照理,饭店经理让儿子偶尔吃顿饱饭是小事一桩,可他从没有私心。

六十七个春秋的终结,谈不上“泰山”与“鸿毛”,也写不了“不朽”与“汗青”。父亲是个平凡的人,他没留下多少遗产,但他的为人、处事、持家,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而有益的精神财富。

他对佛堂的不了情,也使我们后辈对佛堂情有独钟。

想做星辰

◆职场碎记 ⊕杨 力

几年前,我通过校招,进了一家物流公司,在分拣中心任操作员。工作任务是站在传送带旁边,把包裹按区域扔进不同的铁框里。

上班不久,我就发现一个问题:传送带的速度是固定的,但包裹量时多时少。上午十点后货量最猛,分拣员手忙脚乱,经常把包裹扔错区域。下午三四点后,货量减少,不少分拣员站在那儿干瞪眼。分错一单,就要赔钱,还要被客户投诉。我们这个分拣点,每个月因为错分单子赔的钱,够发两个人的月工资了。

我认为这事要引起重视,就写了满满一页建议交给组长。如果传送带改成能调速的,忙时开快,闲时开慢;再调整一下排班,把熟手集中在高峰时段,就能化解问题。组长扫了一眼,笑了:“你才来几天?这传送带是进口的,速度是总部统一调的,不是你家风扇,想快就快,想慢就慢。”

我想不通,开周会时,举手想说两句。组长冲我摆摆手:“新人的意见先放一放,听听老员工怎么说。”老员工们说的都是“要发扬吃苦耐劳精神”“加班加点也要保证零差错”。

第二年,我调到了夜班。夜班更乱,来货时间不固定,有时凌晨两点来一车,有时凌晨五点才来。大家困得不行,动作就慢,传送带边上堆了一摞没分完的货。我又写了一份建议,希望跟上游车队协调,把到货时间尽量固定在零点和凌晨四点两拨。我拿着建议去找新来的主管,主管说:“车队归总部管,我们哪有权力让人家改时间?再说了,这么多年都过来了,怎么就你觉得不行?”

我没再吭声,只是每天默默记录到货时间、货量、错分率、每个人负责的区域。记了整整一年,数据写满了两个笔记本。中间我又交了十几份写有建议的方案,有关于错分赔偿制度的,有关于临时工培训的,还有关于分拣框摆放位置的。但每一份都被退了回来,说我“太理想化”。

第三年,我转成了数据统计岗,不用再做分拣了。但我比谁都清楚那条传送带上的每一个问题。

那年“双11”,爆仓了。总部的货车把货一车车拉来,货是卸下了,可到了分拣环节全乱了套。新来的临时工不熟悉区域,分拣框前堵成一锅粥。货车司机不断按喇叭催,主管嗓子冒烟,拿着对讲机喊:“谁能告诉我,到底怎么弄!”

我从办公室跑出来,手里攥着两个笔记本和一摞方案。三年来,我一共写了三十七份方案。我翻到其中一份的最后一页,指着上面的折线图说:“这是前年到去年每个月的到货时间分布,这是错分率和时段的关系,这是临时工培训时长和错分率的对应表。”

然后,我把一张草图摊在旁边货箱上,上面画着调整后的排班表和重新布局的分拣框。“临时工只负责扫码,不负责分区域。分拣框按区域颜色重新贴标,一目了然。”

主管一把抓过那张草图,看了又看,抬头问我:“你怎么不早说?”

我说:“我每年都说。可能那时候,没人觉得这是个事。”

那个“双11”扛过去后,我那套土办法终于被写进了公司操作手册。直到今天我依旧认为,那三十七份方案并非无事找事,它出自一个普通操作工对职业的敬重,还有一份责任心。

谁不想做星辰呢?可大多数时间,我们就是分拣中心的一盏灯,亮着,却没人注意。但我始终相信,只要这盏灯还亮着,总有一天,有人会在黑暗里抬起头,看见你。



晴阁凌云 二马 摄

一束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五色小花

——《晓峰有约》读后随想

◆文学漫谈 ⊕杨念迅

骆有云不仅是一位高产作家,而且其笔下作品无不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,新近出版的《晓峰有约》,更是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。手捧新书,清新山野之气混合着油墨的清芬,扑面而来。这本仅几万字的小书,把义乌境内并不算广为人知的山区小村晓峰的前世今生,淋漓尽致地铺展在读者面前。掩卷之余,诸多感触在心头翻涌,我索性不再拖延,坐到电脑前把这些想法梳理成文。

《晓峰有约》开了个好头。盛世修志,这些年,省志、市志、县志、镇街志纷纷上马,有的已经历经数轮,但将志书的触角伸向村落的还不多。《晓峰有约》严格意义上还不算志书,但它通过“历史沿革”“往事钩沉”“特色产业”“创业新篇”“风景名胜”“古建遗韵”“民俗风情”“乡间轶闻”“家乡情怀”等版块,图文并茂、全景立体式展现了拥有800多年历史的晓峰村的方方面面。这在义乌,可能走在了前列。如何让存世古村落以文图的形式保存下来,在义乌可能更为迫切。这些年,义乌一些古村落消逝了,晓峰村也是在2017年整体下山异地安置的。为这些已经消失或将要消失、哪怕暂时不会消失的村子留下点念想与归属感,既离不开各方的合力托举,更系于每一位执笔记录者的脚步与笔尖。义乌市地方志编纂室已经着手这项工程,骆有云们已经在奔走、记述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晓峰有约》的编写是一项抢救性工程,值得效仿。

《晓峰有约》体例完备,结构合理,内容充实。几大版块,分头叙述,互相关联,像无数涓涓细流,最终汇集成一个完整、立体、具象的晓峰,将这个山区小村的800年历史完美地呈现出来。文章既有村史钩沉,又有传说故事;既写村貌风景,又写人文特色;既叙民风民俗,又叙特产名吃;既记创业艰难,又记荣誉满墙;既载自然灾害无情,又载红色故事传承;既赞“领头雁”的功绩,又显老百姓的齐心……旧时的乡村除了家谱、族谱之外,几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,全靠一代代人口口相传,不少珍贵的乡土资料就这样慢慢传丢,或变了模样。翻开族谱,其中也会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空白。作者能将晓峰村的历史挖掘至此,相当不容易,可见作者除了一身驾驭文字的能力,还为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。可以猜想,作者写此书,不单单是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,更是将此视作自己的崇高责任。

《晓峰有约》语言生动,叙事流畅,可读性强。书稿中多有引人入胜的描写。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,虽说不是山区出身,但对骆有云笔下的晓峰村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。当读到晓峰人从溪滩改田、凿山开路、兴修水库……一直到异地安置奔小康,恨不得自己也钻进书里,与晓峰人一起战天斗地,分享喜悦;当胡氏宗祠、十八间、十四间、祥聚厅等古建筑在眼前徐徐展开,好像自己也坐在门槛上与晓峰的老少爷们聊天;蜿蜒古道、天坪胜地、清清乾溪、顶天红豆杉……勾起了立马奔向晓峰一探究竟的冲动;吃起来像吸果冻般的五谷香茶焖大蒜,让人情不自禁地口腔生津;面对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业绩的数任晓峰带头人,敬佩之心油然而生。

晓峰已有约,约上三两好友,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晓峰之旅,会一会书中娓娓道来的山山水水。

「义乌商报·绣湖副刊」
稿件征集